

会议中主张：“这样的一个制度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我倾向用‘国家主义’，这个词汇来形容它”。此外，他还断言在目前的历史时期，特别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一样，利皮特并没有解释他的社会主义的涵义。但从文章可知，利皮特所指的显然是某和接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一个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足以克服经济匮乏的社会。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宣称自己的立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上的，他们显然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有任何用处。然而，卡尔·马克思正是为了阐明一个仍以经济匮乏和平等、差别工资劳动和强制国家机器为特征的后革命社会，而展开了这个概念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1875)(原文的着重)

显然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后期展开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准概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孤立的、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它是在经济落后、又面对更强大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存在的。

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最早在西欧发生，然后扩展到北美。因此，他们想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向社会主义和谐过渡的时期。然而，从1917年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开始，历史的实际进程，比他们设想的更为复杂和矛盾。尽管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建成。事实上，从创立第三国际开始，他们为在世界各地打造革命工人政党、以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际斗争，倾注了全部精力。

然而，国际革命的失败，特别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和年轻的苏维埃工人共和国的日益孤立，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为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1923-24年开始，苏联在约瑟夫·斯大林愈发暴虐的统治下经历了官僚民族主义的堕落。尽管如此，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仍对世界帝国主义起了部分的制衡作用，因此使1949年的中国革命及其产生的官僚畸形工人国家的巩固成为可能。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统治者不仅威胁、还确实考虑过动用核武器打击红色中国。他们没有这样做，主要是惧怕这会挑起同拥有核武的苏联的战争。

1949年中共领导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指人民解放军——译注]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胜利，摧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机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蒋介石及其党羽带领残余的武装力量逃至台湾岛。新的中共政权立即确立了它在政治权力和组织方面的垄断地位。由此，中国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政权，而经济在几年后被国有化。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一切从事独立政治活动的尝试都被中共政权无情地镇压下去。毛泽东及其同伙，开始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和政

治架构都以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为榜样的国家。

毛泽东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现实

在1960年代，毛主义以其平均主义的号召、群众运动和以道德替代物质刺激，吸引了世界各地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重复了这种态度，尽管他们比上一代的西方毛派知识分子(如保罗·斯威齐)，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描述为“实现了全民就业、基本社会保障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普遍平等。”

当然，相对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一类的亚洲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诸国，中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平等得多。但中国不但没有超越同时期苏联的平等水平，还事实上在某些重要方面比后者不平等。在50年代中，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有的工薪结构，并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维持了这个制度。最高的管理人员薪级和最低的工人阶級薪级的对比是15:1。此外，和苏联一样，中国高级党政干部、企业经理和同类人物，不但可以而且的确实以多种形式的腐败和寄生行为来补充其正式收入。

中国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的鸿沟，并非始

于邓小平推行的市场导向“改革”。城乡差距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就已经非常显著。在1952年到1975年

间，同乡村劳动者仅有的4%比较，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

费增长了83%。(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中国的政

治经济：1949年米发展的探索》，1987年版)在1980年

(“改革”时代开始的一年)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比农村公社社员高60%，并比后者多吃近两倍半的肉类。在

消费品(如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占有的方面，则存在更大的差距。总的来说，中国城市的平均消费是乡村的

两到三倍。

相比之下，苏联在19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城乡人口生活水平的差距有相当可观的缩窄。当时，一大部分的集体农场自愿改造为国有农场，其工人接受的计划—薪酬和福利，并不随农业产出和政府采购价格而波动。到1980年代初，苏联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以比工厂和办公室工人更快的比率增加。苏联当时可以实现这种更大程度的平均主义，正是因为它当时已达到了远高于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毛泽东时代中国官僚层采取的经济战略，基本上同193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相似。当时为实现经济剩余的最大化，工农的消费水平被压抑，剩余集中投资重工业。在1952年到1975年期间，工业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1%。在1952年，工业产出占中国净物质产品的20%；到1975年，这一比率增长到45%。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为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实现的高经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工业投资的高度资本密集性质，限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扩张和农民社会比重相应的降低。在1952-1975年间，非农业人员占全体劳动力的比重仅从16%增加到23%。

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当局的经济战略在造成

大众的不满的同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障碍和矛盾。

从1950年代中，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每年仅提高1%。这

大部分是官僚主义指令的无能造成的。为抵消这一状

况，国民总收入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投入重工业，以致

重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从1950年代中的24%上升到1970年代初的33%。用于工业扩张的大量经济资源，

主要是通过重税和以人为低价强制征收谷物和其他农产

品的手段，从农民那里榨取出来的。除此之外，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事实上被冻结了二十年。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虽然大体上相当赞同毛泽东的中国，仍然承认这个事实：

“在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损害的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提高了积累率。没有生产率的真正增长，这些高积累和投资水平，是不太可能在不增加人民贫困的前提下长期维持下去的。”

——《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调查，1978—1994年》(1996)

在他们对“改革”时期中国的谴责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给予国企终身雇用制的废除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把它说成是走向他们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定性步骤。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写道：“这在物质上无保障的状况，正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及其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的本质。”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将终身雇用和劳保制度(所谓“铁饭碗”)看作是1949年革命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成果。然而，在一个贫穷和经济上落后如中国的国家，显然既不可能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国企工业的就业，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种保障终身雇用、工资福利水平相当于农村公社社员两至三倍的职位。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禁制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此外，当局并不为日渐增加的城市劳动人口的全体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700万的城市青年毕业后立即被运送到乡村公社，被强迫同家人和朋友分离。假如这些青年有留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做任何工作的选择——即使是没有终身雇用保障、而且工资比一般人低的工作，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认为会有多少人宁愿到集体农场所干活？到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农村公社成为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巨大储藏所。

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目的，是以冒牌的“社会平均主义”的名义来削减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而且，一个在特定的企业终身保障雇佣制度在经济上不但不合理，还会逐渐成为通过更新投资促进生产率最大化的障碍。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厂房设备是在1950年代中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五年计划期间建造的。这一计划的成果是当时中国通过苏联获得的最先进的技术的体现。但到1970年代，很多工业企业已经在技术上已经过时。在一定投资水平下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必须以新企业的投资取代一些旧企业，或在旧企业重新装备新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特定的现存职位将会被淘汰。

邓小平开始的市场导向改革，是企图在斯大林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框架内，解决官僚指令经济效率低下问题的一种尝试。正如我们在1980年代所描述的：

“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之内，存在着一个以市场机制取代集中计划和管制的内在趋势。由于不能以苏维埃民主(工人委员会)的纪律约束管理人员和工人，官僚层越来越将以市场竞争的纪律来控制各个经济参与者的办法视为解决经济效率低下的唯一答案。”

“改革”时代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尽管建造了一个相当可观和相对现代的重工业部门，仍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而80%以上的人在乡村生活。当时的农业产出赶不上工业增长的速度是促成“市场改革”的一个因素；更确切地说，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已成为迅速和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今天，过半的劳动人口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和服务部门工作，而全国人口的40%已城镇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发展。中国工业能力在质量上相应的扩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与此同时，北京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和农村劳动者的一部分人，使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加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滋长了同中共官僚及海外华人资产阶级有亲戚和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并产生了一个富裕和享受西化生活方式的管理阶层；专业人员和技术官僚阶层。

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都说明了这一矛盾现象的两个极端。前者为了证明中国劳动人民的状况在全面恶化而挑选证据。他们指出了明显而持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城市失业的增长，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恶化。而利皮特则为了相反的动机而选择了证据。他指出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尽管各个阶层的改善程度是十分不平均的)。利皮特引用了一些说明在过去几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因政府的政策而脱离了贫困的研究。不论在《中国和社会主义》及其对利皮特的答复中，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都没有引用那些俯拾即是的、说明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改变的基本尺度的统计数字。在1979-1998年期间，制造业工人在价格调整后的年均收入增长达4%。仅在1988年和1989年，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率异常的高，收入才出现了负增长。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在1999-2002年期间，工资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2%。在过去几年，一些主要的工业中心，如深圳和上海，竟然开始经历劳动力短缺，尤以技术工人居多。结果，为了吸引工人，雇主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一位在华尔街银行高盛供职的经济师梁红评论说：“我们正在看到中国极度廉价劳动力的黄金时代的终结。”(《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

然而，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生活水平并非都得到了改善。事实是恰好相反的。从1990年代中开始，中小型私营企业往往以廉价卖给管理人员的方式被私有化。企业的工人被解雇，其中妇女比例失调地占多数。那些(主要在私营经济)找到新工作的人，已是幸运的少数，但他们还要面对薪酬降低和失去大部分或全部在国企工作期间得到的广泛福利的状况。

受国企倒闭影响而经济上特别遭受破坏的主要地区，是一大部分老旧工厂设备的集中地，东北的“锈带”。在这里，多达40%的工人阶级失业。整体上，失业率被估计为城市经济活跃人口的6%-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个指导经济政策的政府部门，推断今

——《通过苏维埃民主实现中央计划经济》，《工人先锋报》第424号，1988年6月3日。重印在《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1988年7月。(引自中文《斯巴达克思》第7号，2005年8月)

年如有8%的经济增长，中国将额外产生1100万个就业岗位。这还不到官方发表的城市失业人员加上新增劳动力共有2500万人的一半。（伦敦《经济学家》2006年3月25日）

城市内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时期不断扩大，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除了新兴的富有资本家阶级外，中国城市现在还有一个生活水平大体上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类人相当的、显著的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士阶层。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城乡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了3.2:1的比例。

这些统计数字不应掩盖农民状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时得到了显著改善的事实。在1978-1997年间，农村地区电力的消费几乎增长了八倍。现在大部分的农村家庭都拥有一些家用电器。利皮特指出，到1997年时，三分之二的乡村家庭已至少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种接触现代化生活的基本手段。

然而，在其它重要的方面，农民的状况恶化了。毛泽东时代的乡村公社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中小学教育，养老金和其它社会项目。在1980-1983年间，邓小平政权解散了公社，以持有土地长期租约的家庭农场（即“家庭承包经营制”）取代之。以前由公社提供的社会项目，现在理论上由地方政府接管。但在中国政府财政极分散的现状下，农村地区乡镇的贫乏税收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农民家庭不得不自掏腰包来支付子女医疗和教育的费用。这种情况的社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

“尽管中国在提供接受教育机会方面取得值得赞赏的进步，一些严重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中国的差异；而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则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而扩大。

“城乡以及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的健康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乡村儿童和母亲的死亡率是城市的两倍……所有指标都显示城乡儿童之间在营养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英文版）

在农村，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即骚动）有急剧的高涨。这些农民抗议和暴动，针对的不是地方官员在没有经过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没收土地，就是武断的征税、腐败和其它官僚主义弊病。胡锦涛政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承诺改善农民状况，对此作出回应。农民的税务负担被减轻，许多农村学童的中小学学费将被免除，中央政府同时计划在农村投入更多款项从事业务项目和投资基础建设。然而，正如《经济学家》（2006年3月11日）所指出的：

“这些措施并不预示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开支仍将仅占政府总开支的8.9%，这比去年的8.8%有所增加，但低于2004年的9.2%。废除农业税和其他对农民开征的费用每年将平均节省每个农村居民156元——大约净收入的1.8%。”

真正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需要经济资源大规模的再分配和再配置。在农村引入现代科技——从联合收割机、化肥肥料到科学农业的整个体系——将需要一个质量上比现存水平更高的工业基础。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将提高对大规模扩展城市的工业就业、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显然地，特别在中国工业基础规模依然有限和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前景进展的速度及其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将取决于社会主义日本或社会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这再次突显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哈特-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争辩说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革”时期里恶化了，他们这个立场的关键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的。他们谴责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在这里，他们的无政府民粹主义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异的立场直接对立起来。他们在对利皮特的答复中，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有份参与《批判的亚洲研究》上关于《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的讨论的左翼学者吕大乐的这个陈述：“1978年后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真正无产阶级化。经济改革使他们真正地被市场支配，并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向他们分割开来。”

在描述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庞大增长，是随着他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分离而发生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意思？除了工业的私有化外，他所指的大概是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入隶属的农村公社的废除。这些农村公社基本上是由使用劳动密集手段和较原始技术的落后小农农庄结合而成的。即使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比邓小平及其继承者统治的时期较为平等，这也只是一种在压倒一切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的、贫穷的平等。

回顾卡尔·考茨基在1899年撰写的《土地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大部分转变为无产者的历史意义是有帮助的。列宁认为这本书是对了解现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考茨基后来的右翼修正主义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视并不能否定其早期著作的价值）。毫无疑问，考茨基描述的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阶段性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的差异。尽管如此，中高级性质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化造成的各种社会影响，还是同这个过程有对应之处的。正如考茨基所描述的：

“工厂通过集中分散的工人，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通过发展交通系统、将知识上较发达的工人从城市带到村庄，它拉近了工厂-村庄和外部世界的距离。因此，这是使部分农村人口接近城市无产阶级、逐渐地唤起他们对后者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兴趣和认识的一种手段。而最终，在有利的条件下，这将使他们得以参与这场斗争。”

事实上，来自乡村的外来工人「到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已经站在了最近的中国工人斗争的最前线。在东南沿海，许多年轻的外来妇女以罢工或其它手段拒绝在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从而造成了2004年夏以来的劳动力达百分之八十的外来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了成功的斗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国放宽了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的限制，但限制本身并没有被废除。被迫从事最危险和卑贱的工作的外来人口，不但没有合法城市居民的权利，还往往被强迫住在隔离的区域。许多城市工人鄙视外来人口，认为他们抢走了工作、压低了工资。在今日中国，一个革命先锋党会为团结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并与农村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结成联盟而斗争。为外来人口争取和合法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住房和公共教育的权利，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展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自由主义者利皮特同白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特-

兰兹伯格和伯克特之间关于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双方的立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的框架之上的。在经济上，双方都否定了资本主义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只能在国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在政治上，双方都否定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展望，这条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解决匮乏的必由之路。

托洛茨基在其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的开创性研究《被背叛了的革命》(1936)中，引用了这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作出的评论：“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马克思著作中为‘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译注]必然复活。”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指的是阶级压迫、不平等和剥削。斯大林主义者们断然否定了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宣扬只要挫败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社会主义便可在一国之内建成的白痴主张。斯大林主义者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他们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在苏联，这种背叛的最终结果，是灾难深重的资本主义反革命。而在中国，斯大林主义的苛政则造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社会。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展现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巨大优越性的同时(这种优越性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远高于印度一类资本主义新殖民地)，也显露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带来的深刻恶果。这些恶果包括大幅度增长中的不平等，与寄生官僚阶层紧密相连的新生产资产阶级反革命威胁的逼近。当前的任务是锻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领导农民的最前列，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12月版〔根据1937年英文版翻译〕)中写道的：

“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要求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被限制于严格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平等……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

